

术产生颠覆性效果的技术，后发国能够产生重新配置全球价值链，并引领全球技术—经济新范式。事实上，“颠覆性技术”已被写入中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等重要文件。在国际制度领域，崛起国可以通过替代型改革路径（“另起炉灶”，新规则替代旧规则）或叠加型改革路径（“掺沙子”，新旧规则并立）改变既有的国际制度轨道，从而提高自身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新兴的议题领域（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极地、深海、气候变化、新能源等领域）的治理中，崛起国更有可能占据先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

时间长短、反应速度与国际冲突

漆海霞*

长期以来，关于国际冲突，学界比较关注的是地理空间因素，例如两国是否相邻，因为这些因素会影响军事投送能力，并进而影响冲突爆发概率。近年来，学界的一个新现象是开始思考时间的重要性。不论时间还是空间，都是各国所处的环境，如果说空间因素是比较客观、比较容易测量的要素，那么时间概念则是相对略为主观、较难测量的概念。从变化方向角度看，时间流逝一去不返，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单向度变化，因此，我们不可能改变客观的时间，但是对于时间的观念则会影响各方的决策与互动。

首先，与时间有关的主观概念是决策者是否短视，如果过度夸大短期风险，很有可能草率陷入冲突升级的风险。例如，在冷战时期，美国选择遏制战略时，其决策依据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理论，因此导致过度反应，盲目升级危机。反之，如果决策者足够远视，则更容易合作。

如果我们用博弈模型中的贴现因子来表示决策者是否有长远眼光，就可以比

* 漆海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长聘副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较好地理解为何远见更有助于合作。在静态博弈或者有限多轮博弈中，在囚徒困境中双方难以突破困境实现合作。而在无限多轮博弈中，贴现因子表示的就是决策者的远见程度，此时，若贴现因子足够大，亦即决策者具备足够的远见，则即使双方处于囚徒困境中也能实现合作。

在此，决策者是否有长远眼光和耐心，一方面与领导人个人素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国内政治有关。例如，如果是领导地位不稳固的决策者，有可能通过对外强硬这一聚旗效应凝聚民心，这种情况下的对外危机转移显然与决策者对国内预期不太乐观有关。另外，观众成本也可能加剧冲突升级风险。例如，在军事威慑中，一旦某国领导人选择强硬举措，且这一选择被国内观众（包括国内反对党等政治精英和关注相关军事威慑的民众）观察到，则后续环节该领导人很难选择退让，因为一旦退让就可能被国内观众视为软弱。因此，若某国观众成本较高，则对外更容易过度强硬，这也导致其外交战略缺乏长远视野。

其次，与时间有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速度。此处笔者认为有两种速度，一者是反应速度，二者是发展速度，两者造成的后果不同。

反应速度是指在多轮博弈中，从某一轮到下一轮博弈所花的时间。反应速度越快，互动次数越多。反应速度的加快会增加互动的频次，如若博弈中每一轮次的时间变得更短，则意味着此前一轮博弈互动的时间在当前可以发生两轮或者三轮互动，其结果就是正反馈（回报）和负反馈（报复）都会加速。此时的作用机理比较复杂。

反应速度对当前外交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中世纪，国家间交往较少，使节往返需要借助马车等工具，动辄数月。缓慢的交通速度降低了外交效率，但是也避免了因信息不充分而草率冲动的决策。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和交通的发达，各国外交反应速度明显增快。从书信、电报到电视、电话、网络等技术的变迁对外交提出了现实的挑战，从现实角度看，在国际社会充斥的不确定性下，反应速度的加快会增加各国应对的难度，甚至增加判断失误的可能。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军方在主张进攻优势的施里芬战略下，认为快速主动出击比未来进攻更好。而其他大国也持类似的进攻优势看法，因此在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后，短短数日之内，德国与俄国、法国、英国陷入战争，“一战”全面爆发。可见，对于战争等极端情况，过于快速的反应有可能加剧事态的严重性，使外交手段等维持稳定的措施难以发挥效果。此外，传播速度的增加并不意

意味着信息质量的提升,在网络时代,充斥着大量虚假信息,反而可能掩盖了真实信息,增加误判可能。例如,在乌克兰危机前,各方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在冲突中的决心大小可能存在误判。

发展速度则是指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或者军事备战速度,这一速度往往会引发国家间的竞争。例如,在权力转移过程中,霸主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战略受到两者发展速度的显著影响。如果崛起国发展速度远远高于霸主国,则可能引起后者的忌惮甚至遏制。从前景理论看,对未来的预期会影响其风险偏好。如果一国持续快速增长,则容易对未来持乐观预期,则其行为可能倾向于风险规避,会比较谨慎,不会轻易冒险,而如果一国增长速度较慢,则容易对未来持比较悲观的预期,其选择可能会风险偏好。因此,借助前景理论中的心理预期分析,我们可以判断,在霸主国与崛起国的权力转移关键时刻,若崛起国即将赶超霸主国,则霸主国可能冒险挑衅甚至轻启战端。因此,发展速度的快慢不平衡可能增加冲突风险。

此外,在安全困境中,军备发展速度可能加深误解。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尽管德国本意并不想挑衅英国霸权,但是在海权论影响下德国大力发展海军,导致英国对德国的忌惮与日俱增,最后公开对德宣战。可见,安全困境下,双方军备的快速增长会导致相互猜忌和不信任的与日俱增。若此时攻防平衡为进攻优势时,双方甚至可能会从军备竞赛快速陷入危机和冲突。

再次,在当今世界,我们还需重视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国际关系中时间维度因素的影响。当前网络技术的发达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将加快各国外交反应速度、拉大各国发展速度差距、增加各国观众成本,降低外交耐心,进而有可能增加冲突的风险。

网络技术对时间维度的主要影响是加快外交反应速度并增加观众成本。随着网络的普及,各国的外交动态会被快速传播,而且不仅是各国政要可以对外交新闻了如指掌,全球对外交新闻感兴趣的老百姓都可以通过浏览新闻了解动态。一方面,快速的外交互动增加了外交失误的概率,降低了灵活变通的空间。由于反应时间短,互动双方政府的部分举措可能缺乏深思熟虑,草率行事下失误的可能性提升,而且网络增加了各国政府日常应对信息的数量,但与此同时网络充斥大量无用信息甚至错误信息等噪声,若对信息没有仔细甄别就作为决策依据,同样可能判断失误。

另一方面，网络技术增加了外交透明度，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大量政治人物的动态，观众可以直接观察到大量决策过程的细节，明显增加了决策的观众成本。例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推动了中美关系改善。而在网络时代，这类秘密外交的操作难度明显上升。此外，网络时代激增的观众成本提升了外交和谈与妥协的难度，例如，对于领土问题和主权问题，冲突双方的民众都可能通过网络发声，表明立场。在没有网络的时代，这些民众可能只是沉默的大多数，即使存在舆论，这些舆论也可能由主流媒体操纵。而在网络时代，发声渠道的增多显然增加了操纵舆论的难度，因此，在面临危机和冲突时，由于担心国内民众的谴责，各国政府选择强硬手段的可能性增加。

人工智能技术对时间维度的影响则是改变各国发展速度和军事攻防平衡。在传统农耕时代，国土面积和人口是国家实力的基础，各国的发展速度是缓慢的。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科技的作用与日俱增。而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对各国经济产业产生重大影响，行业变迁受到新技术升级的显著影响，这也是中美竞争当前主要体现在高科技领域的关键之所在。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对战场上攻防平衡的破坏性目前难以确知。在冷战时期，核威慑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核恐怖下的和平。而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于军事作战时，无人机、自动识别、精准定位等技术可能会降低进攻的难度。当战争决策者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决策时，在主观认为凭借新技术可以提高获胜概率并降低失败概率的情况下，是否会提升草率冲突的概率，目前尚未可知。诚所谓“兵贵胜，不贵久”，即使事后我们才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不一定导致进攻优势，但若事前决策者主观上认为该技术有利于进攻优势，这一攻防认知也会导致轻启战端。

概言之，从时间维度看，我们可以发现既往研究中很多忽略的内容。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战略决策者是否具有长远视野以及各国反应速度、发展速度来观察国际态势。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新技术对国际关系的时间维度具有重要影响。新技术在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存有隐患。例如，外交事件反应速度的加快使外交失误的可能性增加，而网络时代的高度透明化也使传统可以借助秘密外交加以转圜的操作空间降低，此外，军事作战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攻防优势和战略判断变迁更值得关注。当然，若我们提前预估技术进步可能存在的对于国际事务的漏洞，有助于我们未雨绸缪，充分获取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

会的助力，避免其可能的隐患。在新的时代，中国外交面临诸多新技术带来的挑战，从时间维度着眼，如何既保持战略定力，又能在中美竞争的态势中成功应对，这是当前中国外交需要解决的难题。

“中时段” 权力转移与意识形态^{*}

黄宇兴^{**}

权力转移理论讨论霸权国与崛起国的互动在何种条件下会由和平状态变为大规模武装冲突。既有理论对“中时段”权力转移的解释存在一定局限。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笔者聚焦于国家层次，以崛起国或霸权国具有单一或多种意识形态分析框架及其匹配情况解释“中时段”权力转移结果。若崛起国或霸权国均依据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分析彼此关系，则权力转移容易诱发大规模武装冲突。若崛起国或霸权国均依据多种意识形态框架分析彼此关系，则双方互动可推动和平的权力转移。笔者将以 1933—1939 年欧洲和 1965—1972 年印度支那的权力转移对上述理论框架做简要的说明。

一 “中时段” 权力转移及其结果

权力转移理论讨论霸权国与崛起国的互动在何种条件下会由和平状态变为大规模武装冲突。既有理论认为，在全球或地区层面军事能力最强大的国家为霸权国，而军事能力位居第二且不断接近霸权国的国家为崛起国。根据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提出的层次分析法，既有理论从体系和个人层面讨论了权力转移的结果。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和道格拉斯·兰姆克（Douglas Lemke）从体系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全球或地区层面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相对能

^{*} 本文得到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权力转移背景下的联盟研判”（项目批准号：2021THZWJC16）资助，特此致谢。

^{**} 黄宇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长聘副教授。